



政治局

—— 一个神话的结束

京特·沙博夫斯基采访录



D5
162

00136428

类别:	D
分类号:	D5
登记号:	4181

政治局

——一个神话的结束

京特·沙博夫斯基采访录

[德] 弗朗克·盖伦 路特维希·屈纳 著

孙瑞英 陈平 李中人 译

李中人 校



(内部发行)

贵阳学院图书馆



GYXY1364283

世界知识出版社

(京)新登字021号

Frank Sieren und Ludwig Koehne

Das Politbüro

Günter Schabowski

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 GmbH, 1990

根据汉堡罗沃尔特出版公司 1990年德文版译出

责任编辑：洪 梅

封面设计：丁 品

政 治 局

——一个神话的结束

京特·沙博夫斯基采访录

[德] 弗朗克·西伦 路特维希·屈纳 著

孙瑞英 陈平 江中人 译 江中人 校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31号 邮政编码: 100005)

北京华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787×1092毫米32开本 印张: 6.5 字数: 138000

1992年9月第1版 1992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

ISBN7-5012-0533-7/D·98 定价: 3.10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京特·沙博夫斯基是原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成员。自1968年起曾长期担任《新德意志报》的副主编、主编。1985年起任柏林专区党委书记。

1989年是原民主德国形势发生急剧变化的一年。在这个关键时刻，德国统一社会党面对关系到生死存亡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态度如何，开放边界的决定是怎样作出的，对国家形势的发展起了什么作用……沙博夫斯基是这段历史的重要见证人，他在本书中详细叙述了事态发展的前前后后。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了解原民主德国变化的前因后果，我们将本书全文译出，供研究参考所用。

1992年6月

出版者关于本书的说明

“出国进行私人旅行，现在无需任何先决条件，无需旅行护照和说明亲属关系，即可申请。”当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京特·沙博夫斯基于1989年11月9日宣读这个决定时，他无法想象到，就在当天晚上，对柏林墙的冲击开始了。他说：“我的想象力不足以预见到这一点。”

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国家里，京特·沙博夫斯基的仕途生涯青云直上，他是僵化的政治局里第一个要求实行改革的人。在国民日益强烈的压力下，他同埃贡·克伦茨一起推翻了总书记埃里希·昂纳克。那些非常熟悉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官僚阶层的人，很早就注意到：他注重务实而不教条，倾向于改革而又玩世不恭。他的才智有一定的吸引力，这使他在政治局的灰色集体中显得与众不同。

在这本书里，沙博夫斯基描绘了打开柏林墙的决定是如何作出的，政治局的政策是怎样产生的，那次“政变”又是如何完成的；戈尔巴乔夫对昂纳克的下台起了什么作用；昂纳克、米塔格和米尔克的三头政治是如何进行统治的；那次伪造选举结果是如何进行的；以及克伦茨领导的半心半意的革新尝试为什么遭到失败。

京特·沙博夫斯基不仅是一个重要的见证人，他作为主要领导人之一，也必须在道义上对所发生的一切承担责任。他在回答中试图说明，是什么动机促使他身居中央要职参与

一个国家的种种活动，而这个国家却企图用专制手段来实现“人道主义的空想”。

弗朗克·西伦，生于1967年，自由记者，常为《时代》周报、《德国广播电台》和《法兰克福评论报》撰稿。

路特维希·屈纳，生于1966年，在牛津大学攻读哲学、政治学 and 心理学。

一个神话的结束

前 言

一个神话越是讳莫如深，就越加牢固地印在人们的脑海里，它促使我们去解释那些看不透的事物。在动荡不安的变革时代，神话会滋生蔓延。在民主德国和平革命的一片欢呼声中，对于政治局这个秘密集团及其成员的议论，真相和谣传混杂交织，人们对此既感到神秘莫测，又产生种种混乱的概念，从而妨碍人们真实地看清问题。

这段时间里，领导层中的一位传奇人物像幽灵一样在人们的脑海里萦回，他就是政治局里的“高官”——京特·沙博夫斯基。他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不同点在于，似乎有一点聪明才智，看起来不像统一社会党和国家权力中心机构中那些与其说是红色还不如说是灰色的同志那样脱离现实和拘守教条。他在疏远群众多年以后，脱离了其无能的同志们的行列，于1989年11月站在柏林红色市政厅的台阶上与公民们讨论问题，而没有被群众的嘘声吓倒。这些都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埃贡·克伦茨领导的革新尝试于1989年12月失败以后，我们想知道，沙博夫斯基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想认识一下这个曾经参与承担责任的人。在寻找他的地址时，我们受到来自东部和西部许多方面的警告。有人说，沙博夫斯基是

个“躲在幕后的要人”，对他要极其小心谨慎。一些人称他是“善于看风使舵的媒介沙皇”，另一些人则说他是“克伦茨的帮凶”或是“狡猾、无情的玩弄权术者”。

也有些人把他描绘成“半瓶子醋戈尔巴乔夫”，说他作为柏林专区的首脑实行统治时没有那种压人的姿态。那么，沙博夫斯基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他在那个统治结构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我们想知道：政治局是如何制定政策的？政治局是怎样被推翻的？我们对沙博夫斯基宣布的打开柏林墙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感兴趣。但我们一点也没有把握，不知道沙博夫斯基是否会让我们进他的住房，他住在勃兰登堡门和波茨坦广场之间原死亡地带附近的一个出租的公寓里。在1989年12月初德国统一社会党的特别党代会上，我们曾试图同他接触，当时他正和克伦茨在迪那摩体育馆的长廊里神经质地走来走去。那时，他生硬地拒绝了我们。第二回尝试，我们该多些运气了。

电动门铃响了。我们通报了自己的姓名之后，就被放了进去。九层的门开了。沙博夫斯基令人大吃一惊，他身着牛仔上衣和牛仔裤，脖子上挂着一副花镜，手里拿着一把螺丝刀。我们相互带着怀疑的眼光寒暄之后，他请我们进屋。这个人已没有任何威风的样子，尽管他全神贯注，但仍显出疲倦的样子。他的双颊已经下陷，看样子这几个星期他已瘦了好几公斤。

“你们也是这样组装衣柜的吗？”他用螺丝刀指着堆满衣柜部件的走廊问我们。我们从窄小的盘旋楼梯爬进了阁楼上的工作间。当我们走进的时候，笼子里的一只灰色鹦鹉怯生生地歪着头。大量的书籍非常显眼。沙发上放着一个手提吸尘器。

他想知道，我们为什么偏要找他谈话。后来我们得知，我们是他下台后最早对他发生兴趣的人。像他这样一个曾在德国统一社会党权力中心工作过的人，在新的德国是不受欢迎的。

沙博夫斯基开始叙述。他想的问题很多，以致他的回答成了独白，而我们几乎没有提问的机会。他思绪万千，这位61岁的人现在有深思的时间，因为他也找不到工作。他渴望人们理解，但并不哀求，他说：“我不要怜悯。”他如此坦率而又精确地说出他对自己处境感到无可奈何，这使我们感到惊讶。我们逐渐理解到，他陷入了多么复杂的思想状态之中。是什么东西促使像他这样的人参与统治这个国家，而这个国家试图用专制的手段来实现人道主义的乌托邦？我们约好继续谈。本书就是从这些谈话中产生出来的。

大部分提问并不像书中所描述的那样进行的，而是由不同的谈话合并而成，我们又给它加上了简短的引言。那些只是为了使情节得以展开而提的问题，我们把它们删去了。但补充提问常常使我们了解到一些令人吃惊的细节。有时候，这种追问也使我们在一些小事上卡住，陷入僵局。这时，沙博夫斯基就向我们指出：“你们想想看，如果你们要记述一次已经过去了一年的重要的编辑会议，有人问你们：迈耶先生当时讲话时，米勒先生是什么表情？为什么让施密特先生去取咖啡？”沙博夫斯基需要时间，以便从外部观察那个他曾是其中一部分的制度以及他的一生。

京特·沙博夫斯基不是在一个共产党人的家庭里成长起来的。他的父亲是白铁工，母亲是清洁工，都是不问政治的工会干部，但较倾向于社会民主主义，因为社会民主主义对他们来说似乎不是那么僵硬或教条。他们唯一的孩子是1929

年在沃波莫瑞的安克拉姆出世的。京特是个勤奋的学生，因而被允许上高级文科中学，尽管20马克的学费对家庭支出来说是个负担。战争期间，他进了儿童收容所，战争结束前后又进了萨克森的军事训练营，1945年从那里徒步跑回了家。同年，他在原来的安德烈亚斯实科中学通过了中学毕业考试，这是柏林最早恢复上课的中学之一。这样，他比大部分同龄人早毕业了一年。他曾担任《柏林工会报》的地方记者，后来当过实习生、助理编辑，最后成了编辑。

京特·沙博夫斯基在压制人的统一社会党和国家里，仕途生涯青云直上，不同寻常。“社会主义的不幸”却使他得到好处。1949年他加入了“自由德国青年联盟”，三年以后成为德国统一社会党党员。1953年，工会报纸——《论坛报》领导层换人，起因是该报在一篇报道斯大林逝世的文章里出现了重大的印刷错误，把斯大林是“和平的主宰”误印为“战争的主宰”，沙博夫斯基在这一天恰好休息，于是他得到了提拔。24岁的沙博夫斯基当上了该报的副主编。他在这个职位上干了14年，一直处于待提拔之列，直到1967年才被认为有发展前途，被派到莫斯科高级党校去学习一年，这是当时对并不很年轻的同志采取的通常做法。1968年8月21日，当他作为副主编来到《新德意志报》办公室时，编辑部正准备在苏军入侵捷克后出版一期特刊。又一次不幸事件促成了他在《新德意志报》的晋升。负责鼓动和宣传工作的中央书记京特·兰贝茨1978年因直升飞机失事而遇难，当时的主编约阿希姆·赫尔曼接管兰贝茨的党内工作，沙博夫斯基便升任主编。后来又作为候补委员进入了最核心的权力圈子——政治局，1984年他当选为政治局委员。一位同志的垮台促成了他的进一步晋升。在昂纳克把卷入丑闻的柏林专区书记康拉德·瑙

曼开除出政治局以后，在《新德意志报》上始终忠实地刊登昂纳克照片的沙博夫斯基便平步青云，于1985年接管了重要的柏林专区，并且一直领导该专区，直到发生革命。

在革命事件中，沙博夫斯基也起了重要作用。当大多数政治局成员还自以为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面对大批逃亡者而感到不知所措的时候，他是僵化的政治局里第一个站出来要求变革的人。他固执己见，而不再顾及团结一致。这个一向官运亨通的人同埃贡·克伦茨一起推翻了埃里希·昂纳克及其强硬派追随者，并试图开始实行改革。

那么，他是不是一个特别狡猾的、为了保护自己而及时改变态度的“变色龙”呢？沙博夫斯基究竟是否可信？

促使沙博夫斯基说真话的因素，不仅是他为被推翻而感到恼怒，还因为他回想起自己曾享受过民德公民所得不到的特权而产生的羞耻感，特别是因为他参与了不公正的、背叛了人道与公正的社会主义事业而产生的负罪感。向真理靠拢是他的最重要资本，以便能找到立足的基础。

我们在同沙博夫斯基进行谈话的过程中开始对他敬重起来。他的自我嘲讽，对过去的批判态度，对所遇见的人们所抱的好奇和坦率态度，还有他的骄傲以及决不无条件地屈辱于人的顽强精神，都说明了他的性格特点。这些性格特点不能因为他的过错而一笔勾销，它们是构成沙博夫斯基这个人物的的重要因素。尽管如此，事实却是：沙博夫斯基对一个不容忍这些品德存在的压制人的制度恰恰也负有责任。

被推翻以后，政治局以及作为其成员之一的沙博夫斯基借以生存的神话破灭了，那些邪恶的东西变得那样的乏味。政治局充满着圆滑、迟钝和偏见，它的权力不过是习惯势力。斯大林主义的压制是极权主义田园诗的管理行为。汉斯·马

格努斯·恩策斯贝格尔写道：“没有比坚持原则的杀人狂更公式化的东西。任何一种极端主义都带有照章办事、甚至官僚主义的东西，而这种极端主义所依据的仅仅是原则。当人们谈论忠于原则时，却已经忘记了，人们只能背叛人，而不能背叛思想。”

容忍犯罪行为这种极端的忠于原则，其根源何在？仍然是需要回答的问题。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人们不会再借口似乎是美好的原因而建立起镇压别人的压制制度。但是，如果人们意识到了教条主义的根源，至少可以早些时候加以认识和克服。即使在一个民主国家里，这样一个认识过程也不可能自动地完成。不久前去世的社会学家诺贝特·埃里亚斯在他所著的《宫廷社会》一书的序言中写道：“人类造型的变化，与某一代人是否有可能将其所积累的经验作为所获得的社会知识传授给下一代紧密相联。但是，积累和传授知识的连续性有可能被中断。知识的积累本身不能给人类带来遗传变异。所积累的社会经验有可能再丢失。”

为了前进而学习，这个要求听起来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环顾四周，人们不得不感到吃惊。资本主义的经济鹰派目光短浅地庆贺胜利，环境破坏者和坐享其成的政治家们洋洋得意，人们对此也许可以理解。他们为了掩盖自己的失误，自鸣得意地手指着可恶的共产党人，幸灾乐祸地庆祝路德维希·艾哈德对卡尔·马克思的胜利。这也许是人之常情，但却是荒唐的。一种意识形态的狭隘观念崩溃之后，它的对手就沉浸在自我陶醉之中，而不是扪心自问，如果他生活在易北河东边，他该如何表现？一旦这种学习过程同令人不愉快的自我批评联系在一起，偏见就成了怡然自得的态度。

这种顽固不化的态度不是西德右翼人士所独有的。早在这本书出版之前，民德的作家们就抱怨说，像沙博夫斯基这样一个不齿于人类的家伙竟然在这本书里得到发表言论的讲坛。那些联邦德国一直在指责的没有克服过去的有经验的反法西斯主义者的态度更是强硬。在他们看来，对那些出卖了社会主义价值的人，应当原封不动地保留其敌对者的形象。就连实际上并不属于教条主义者的沃尔夫·比尔曼，也在1990年5月的《时代》周刊上撰文拒绝埃贡·克伦茨与之会面的建议，他说：“不必为了了解什么是大粪而跳进粪坑里去游泳。”这种强硬的立场源自一种正当的担忧，即担心那些有罪的人可能逃脱罪责。“如果大的罪犯将自己吹嘘为人类的朋友，那么小人物怎么能意识到其微不足道的羞耻呢？”其中也掺杂了这样一种想法，即阵线不能解体。一旦被认定是变色龙的人，即使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也不能改变自己。这样，展开公开辩论的气氛就被阻止了。

但是，人总是在变化之中或至少会重新组合他的种种矛盾。不论怎样，他们有能力认识到自己的过错并理解其错误。他们可以学会如何对待过错。京特·沙博夫斯基公开地同他的过去走上法庭，他不想排除任何东西，而是试图加以解释，当然也是为自己辩护。他的陈述不是为了掩盖矛盾，他准备参加讨论。

弗朗克·西伦

路德维希·屈纳

1990年9月于特里尔 牛津

